

壹、前言

一、問題意識

教育係促成社會正義的核心與關鍵途徑之一，在教育體制中實現社會正義，強調變動社會的教育公平分配，是各階段教育的使命。楊深坑（2008）曾以社會正義和差異政治在不同學者之間的論辯為題，包括Rawls、Habermas、Young與Sen等人的主張，交互印證，釐清社會正義理論在教育實踐上的參照價值，發現教育規劃能否切合社會正義的目標，需從理念與政策、制度與結構、課程與教學、評量與進路、教師與學生和特殊處境學習的教育處置為關照，在各個層面加以突破和重建，才能促進教育場域之社會正義實踐。Rossouw（2015）將社會正義的成果視為優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的一環，並且指出社會正義既有人力資本，亦有人權的意涵，在評判教育績效表現的確保時，它是重要的衡量基準。

易言之，檢視大學校院中社會正義獲得落實的程度與品質，乃是教育社會學研究之關鍵議題。2003年，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便曾發動一項長達三年期的「從教室到社區之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from classroom to community）方案，透過評估、實踐對話、團隊會議、專家會議、實習演練等系列的學習歷程，促進學生成為社會行動主體，力求高等院校成為連結多元文化和社會正義的主要助力（Clark, Bouis, Subberman, & Balon, 2004）。

2012年，美國之教育領域學者所籌組的國家委員會在選定年度書籍時，挑選了《社會正義、競爭和品質：21世紀領袖的挑戰》，此書表述了在21世紀當中，關鍵的挑戰在於如何培養學生具有社會正義的素養與能力（Perreault & Zellner, 2012）。概括地說，社會正義的實現，乃是資源分配均等、所有社會成員在生理與心理均感受安全有保障的構成；社會中的個體既可以自己做決定，充分發揮能力，也可以是獨立個人，體驗民主生活，對他人及社會都應負起責任。

針對社會正義之整體社會觀感與評價的分析，林瓊珠（2011）就「公民意識與社會正義」計畫的調查進行分析，以臺灣民眾主觀的社會階層認同而言，當由「0～10」自我評價時，自認為位居於「4～6」者將近五成；但在「我們社會上比較沒有錢的人和比較有錢的人之間的矛盾嚴不嚴重」的看法上，有高達五成九（58.6%）的民眾認為係「非常嚴重」的狀態；主張「政府應該縮小貧富差距」的比例為七成七（77.4%），若遭遇政府財源有限的條件，臺灣民眾比較希望發展經

濟或是社會福利？有高達六成六（66.1%）認為應該以「發展經濟」為先，亦呈現民眾對於國家、資源配置和選擇的歧異。

與此同時，整體社會邁入M型結構的兩極化，中產階級消退的悲觀現象，讓社會正義根基更受衝擊。蕭新煌（2007）指出，臺灣的中產階級雖未消失，但部分中產階級因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危機，向下流動為「低層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焦慮和不安，反映於對政治改革的疏離。復以，有工作能力卻失業的人口增加，物價持續上漲，而薪資所得卻未見調整，因而出現所謂的「新貧族（新形成的貧窮群體）」或「青貧族（青年的貧窮群體）」的群體，成為社會各界重視和討論的議題。而青年族群面對國債與社會保險的財務風暴、環境生態的超限利用、經濟機會與資源的壓縮、生活品質提升的窒礙時，其處境更加嚴峻，此「崩世代」之受剝奪感日深，甚至衝擊社會的發展（張烽益，2012）。

在教育相關探討的論述上，呂晶晶（2008）指出，教育城鄉差距加劇和教育機會不均愈來愈嚴重，離教育正義的實踐愈來愈遠。陳美如（2000）認為，當前過於偏向對弱勢者的補償，惟社會正義不應只是物質的分配，也應涵蓋政治、法律、社會與文化層面。譚光鼎（2007）指出，學校教育除著重有效的學習輔導、合理的資源分配之外，更應進行批判意識檢討，以促進社會正義的實現。這些相關研究成果揭露青年世代的學習歷程對其社會正義素養的影響，對本土教育脈絡的發展具有價值。

無論宏觀或微觀、期望或憂心，在在顯示社會正義是確保社會穩固運作基礎的核心理念，面對現況的條件和未來的發展，值得探詢的是，當前青年世代對於社會正義的認知、價值與行為之判斷和實踐樣貌，其觀感為何？其價值取向為何？以及正義的實踐意願為何？若能探討這些相關的實徵研究成果，將有助於我們看到學習主體之現象和經驗，瞭解大學生對於社會正義知能之價值取向和行動參照架構。職是之故，本文特別以「社會正義」為題，期能瞭解高等教育現場的實徵現象，以釐清增進大學生社會正義素養的可能判斷方針與作為。

二、研究目的

本文藉由量化研究取徑探討大學校院學生之社會正義素養，以釐清大學生的意見分布、相關情形與影響機制。本文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一）分析大學生對於社會正義之原則支持、取得成就、知能增進意願及行動